

读中国旧小说

文/曹寇

近大半年来,一直在读(包括重读)中国古代小说。鲁迅已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小说做过明晰的分类,这一分类已经涵盖了小说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将这些关系挪用于西方小说,我觉得亦可用。说白了,小说就是描述人间景象,宏观微观均在其内。

白话文以来的中国小说几乎完全放弃了旧小说的传统,这和整个语境有关。晚清开始的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衰败,要求“崛起”和“复兴”,这一民族情感也影响到了小说。小说样貌自此彻底改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救亡图存之外,还要强大,也就是要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化论是当代成功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中国白话文小说在大面上上和纺织、军工等实业一样推动中国的进步,或按鲁迅的话说:“改变人种”;在小面上上亦可使作者本人的文学野心达成,再不济也可成名成家。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自发轫之始,其功利主义就是写在脑门上并深入骨髓的。不过,无论大小功利,按照马科斯·韦伯的观点来看,遵循的也仅仅是“责任伦理”(当事人对其行动后果负责),并无“信仰伦理”(基督徒的一切荣誉归功于上帝)的影子。

不过,诚如某句俗话所说“艺术从来不在进化论体系之内”,小说亦然。一百年来的白话文小说的孜孜以求,似乎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国的小说高峰仍然在明清。“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此类虚饰本就是个笑谈,印在腰封上除

了让有识之士不屑,也只能算个外行的商业广告用语。而“当代《红楼梦》”、“当代《儒林外史》”……则大不同,既不幽默,也不可比,除了恬不知耻,好在仍不失致敬之意。名著在上,其势巍峨,叹为观止,不服不行。

中国旧小说的好,在我看来,理应是共识,没有辩论的必要。在很多时候,就我个人而言,比较之下,中国旧小说的好与西方经典的好,前者更得我心。而中国旧小说的好,好就好在功利主义的无所所有和自由主义的甚嚣尘上。

众所周知,在皇帝被推翻之前的中国语境中,小说因不便为圣贤发声乃至海淫海盗而往往被排除在正统之外,“禁”和“销毁”是它们最普遍的命运。在中国,诗是高贵的,李贺可给王昌龄递诗求举荐。小说呢,晴雯就是小说:“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一源自话本、来自勾栏茶肆的文体,混迹于市井小民,荡漾于戏子婊子之间的表达方式,很是卑贱。一部小说写完,作者甚至懒得署上真名。比如说吧,“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作者很清楚的一点是,《金瓶梅》不仅无法带来名利上的好处,反而可能对其“清名”构成玷污。曹雪芹的《红楼梦》没写完就被抄杀了,一时震动京城,直达天听。而作者本人还是“举家食粥酒常赊”,最后在除夕泪尽而死。

那么,使用毛笔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上百八十个章回洋洋百万言的动力,到底在哪里?那只能是美学追求以及掏心挖肺的抒情欲

望。这一欲望并非刻板的表制文体和娇小的诗歌所能承载,亦并非平庸肮脏的现实世界所能疏浚。他必须亲手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与己身相交抑或平行的世界里方能获得精神层面的酣畅和自由。小说的写作因为功名的不在场,因为不存在任何审查和自我审查,因为极端的私密性,反而构成了写作上的自由。这一自由,既确保了才华的倾泻,也造成了恶俗、淫乱、暴力等一切极端现象。旧小说的极端现象几乎是普遍的。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即有最大限度的极端。

当然,小说写出来是给人看的,一如话本是要在勾栏里表演的。在古人的小说写作中,潜在和想象中的读者可能才是唯一制约作者的因素。讨好、卖弄、迎合、寻找知己,不一而足,他们因此竭尽能事,无限放大自己的才能(好作品),或放大自己的无能(烂作品)。淘洗之后,平庸之作鲜有人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那些杰作。这些数百年前的杰作,就眼下看来,从来没有思想观念上的远见卓识,也从无技术层面的创新,但它们仍然美艳无比、感人至深。这似乎是无法解释的。这就好比当我们仰望星空,亿万年来,星空几乎永恒,群星闪烁,何尝有过一点新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仰望星空?为什么常常感动?我想,与星空有关,中国旧小说或许存在韦伯所说的“信仰伦理”。也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着高于时空的事物,中国旧小说传达了这一事物。■



圣约翰大学藏书票 摄影/黄发有

“东方哈佛”的旧踪

文/黄发有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这所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大学,其前身为1865年设立的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这两所书院都只有高小程度。经过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的努力,在颜永京牧师的协助下,1879年9月1日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为圣约翰书院。1906年,圣约翰在美国注册,正式升格为大学,逐渐奠定其“江南第一教会高等学府”的地位。该校培养了顾维钧、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周有光、严鹤龄、孟宪承、刘鸿生、经叔平、施肇基、潘序伦、周诒春等杰出校友,被誉为“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的养成所”。1927年,《约翰年刊》上刊发《老约翰所造就之人才》,其中有言:“约翰虽有东方哈佛之号,自1879年开办至今,已历四十年,为中国最早之大学。此半世纪中,所造就之人才,何止千数。”

圣约翰大学的藏书票下方有三行英文字,意为“圣约翰大学,上海,罗氏图书馆”。藏书票的上方有美国圣公会的标志,核心图案为一座中式牌坊,正中书写“圣约翰大学堂”,一位学生模样的人背对读者,正要穿越牌坊,前方迎接他的是从一座十字架上喷射出来的耀眼光芒,以一种象征的形式诠释了圣约翰大学英文校训LIGHT&TRUTH(光与真理)的深层含义,即在这座校园里追寻光明与真理。牌坊右边写着“博学于文”,左边写着“约之以礼”。藏书票右下方有藏书票制作者的签名——William Edgar Fisher,常被忽略的是落款时间——1913。藏书票收藏家龚晏邦和吴兴文都以为牌坊图案是对校门的真实写照,事实上校门建于1929

年。

罗氏图书馆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曾任纽约市长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罗氏(Seth Low)及其弟弟(William Gilman Low),他们向圣约翰捐赠了多种图书。1916年初夏,罗氏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由于圣约翰大学声誉卓著,从社会各方获得了大量的捐赠图书。通过校友宋子文牵线,1933年盛宣怀的后人将其珍藏的66607册中文书籍捐给罗氏图书馆。1948年,严复的女儿又把其父珍藏的中英文图书1993册赠给罗氏图书馆。1932年之前,罗氏图书馆还接受过不少捐赠的图书,而且大多为古籍善本,像潘明训捐助的294册图书中,就包含了宋元明版的珍贵古籍。

圣约翰的成就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卜舛济,他于1864年生于纽约,从1888年至1941年一直担任校长,鞠躬尽瘁。他在学生中享有崇高声望,林语堂在自传中认为:“我这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态度不是由书籍所教的,却是由圣约翰的校长卜舛济博士(Dr. F. L. Hawks Pott)和其他几个较优的教授而得;他们都是真君子。”卜舛济1941年返回美国休假,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只能滞留在美国。直到1946年才回到上海,当时他已82岁,体虚多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儿是我的家,我要永远在这儿,直到老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的相关院系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第二医学院,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在走过七十年的坎坷长途后,如同夜色中的行者,隐没进历史烟云。■



老宅秋趣 画作/季全保

生命的宽度

文/唐櫻

冬山兄相继出版了《白桦悲歌》和《樱花凋零》后,他的《女神之殇》又出炉了,这是一本从文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悲剧性艺术人生的著作。

自由女神像,承载着美国精神,也是美国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女神之殇》所撰写的十位美国文化名人,大多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死跟生的意义是一样的重大,甚至说死就是生的另一种活法。杰克·伦敦死于破产与精神分裂,罗伯特·霍华德由于抑郁和母亲逝世而自杀,素来以文坛硬汉著称的海明威,在家中自杀身亡。我们从《女神之殇》中看到,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性情一直敏感多疑,约翰·贝里曼是一个极度孤独的人……从事艺术的人们对现实社会有着超凡的洞察力,属于极其敏锐“高

感者”。尖尖的笔仿佛如锋利的手术刀,在各种病灶上切割,好像能撑起一片天,但笔或许戳中某一个痛点,现实还是现实,黑暗还是黑暗。这时候,性格偏执的文人们要悲恸了,要无力了,要愤怒了,然而这还不能挽回什么,压抑使人绝望,闭上眼睛吧,不看,永远地闭上眼睛。人间不过如此,他们不怕自己的离别成殇。

我们不赞成这种对抗和逃离的方式。但他们如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只一瞬,却美丽长存。有一本杰克·伦敦的传记叫《马背上的水手》,这个标题特别好,再强悍的水手,能在马背上奔驰多久呢?

细想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死亡也需要勇气,死亡也是一种活的方式。生和死不过是一种选择,有的人死了,他的作品或者精神还永远活着,这与单纯的物理性

死亡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于是我忍不住回望,回望历史的时候我看到了屈原投江,看到了老舍投湖,看到了傅雷和赵树理,还看到了海子……

殇,何以成殇,不独因为死亡。殇,何以成殇,不独因为抑郁、悲痛或迷惘。从书里到书外,从《女神之殇》开始,重新一遍遍思索、一程程回望,作为一个文人,要如何给自己定位?从历史故事中走出来,我们应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否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我对自己的心愿很小很小,可对文学的心愿很大很大。

但愿让“殇”成为历史,不再重来。■



圣约翰大学数学系藏书印 摄影/黄发有